

汉越语“手”表人类词缀对比研究

阮文公

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吉林 长春

收稿日期: 2026年4月20日; 录用日期: 2026年5月29日; 发布日期: 2026年6月9日

摘要

“手”作为高频人体部位词, 在汉语与越南语中均具有较强构词活力, 通过隐喻与转喻机制演化为表人类词缀性成分。本文采纳“类词缀”的操作性定义, 结合认知语言学、语法化及语言接触理论, 依托《BCC语料库》《Vietlex语料库》筛选语料, 系统对比汉越语“手”表人类词缀的语义演化、构词特征、语用特征及文化认知差异。研究发现, 两种语言均遵循“手→操作→能力→人”的隐喻路径, 但语法化程度呈现层级差异: 汉语“手”已发展为高度语法化的类词缀, 趋向规范稳定; 越南语形成双轨系统, “thủ” (汉越词) 为中度语法化弱类词缀, “tay” (纯越词) 为低度语法化半实义成分, 灵活性更强。这种差异源于语言系统演化、文化认知模式及语言接触的历史积淀, 揭示了语言接触中“外来构词成分趋向词汇化封闭、本土成分保持构式开放”的功能分化模式。

关键词

汉越对比, 手, 类词缀, 隐喻, 语法化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Human-Denoting Affixoid “Hand” in Chinese and Vietnamese

Wengong Ruan

School of Liberal Arts,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Received: April 20, 2026; accepted: May 29, 2026; published: June 9, 2026

Abstract

As a high-frequency body-part term, “hand” exhibits strong word-formation productivity in both Chinese and Vietnamese. Through mechanisms of metaphor and metonymy, it has evolved into an affixoid element denoting human agents. Adopting an operational definition of “affixoid”, this study

integrates perspectives from cognitive linguistics, grammaticalization theory, and language contact theory. Drawing on data extracted from the BCC Corpus and the Vietlex Corpus, the paper systematically compares the semantic evolution, word-formation patterns, pragmatic functions, and cultural-cognitive differences of the human-denoting affixoid “hand” in Chinese and Vietnamese.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both languages follow a shared metaphorical pathway of “hand → operation → ability → human”. However, their degrees of grammaticalization differ hierarchically: in Chinese, “shou” has developed into a highly grammaticalized affixoid with increasing standardization and stability; in Vietnamese, a dual-track system has emerged, in which “thủ” (a Sino-Vietnamese element) functions as a moderately grammaticalized weak affixoid, while “tay” (a native Vietnamese form) remains a low-degree grammaticalized, semi-lexical element with greater flexibility. These differences stem from the historical accumulation of language-internal evolution, cultural cognition, and language contact. The study provides a representative case for Chinese-Vietnamese comparative research,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language contact studies, and also offers implications for bilingual teaching and transl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Vietnamese.

Keywords

Chinese-Vietnamese Comparison, Hand, Affixoid, Metaphor, Grammaticaliza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在词根与典型词缀之间，存在一类属性界定存有争议的中间性语素，如“者、家、员、派”等。此类语素具备鲜明的过渡性特征：其一，独立性较弱，大多无法独立单用；其二，搭配具有倾向性，部分语素仅能单向构词，部分双向构词语素也存在搭配频次失衡的特征；其三，语义层级介于词根与词缀之间，相较于实义词根语义更泛化，相较于典型词缀仍保留实词语义残留、虚化程度不完全；其四，能产性适中，构词生成能力优于典型词缀、弱于虚词。陆志韦[1]等学者早在1957年便注意到“读者”之“者”、“作家”之“家”等语素的特殊性，提出将其单独划分归类。在此基础上，吕叔湘明确提出类前缀、类后缀概念，界定该类语素：部分语素近似词缀却未完全符合典型词缀特征，语义虚化不彻底，部分语境中仍可保留词根属性，因此归为类词缀。

在汉语本体研究领域，“类词缀”术语认可度较高，张斌[2]、王洪君[3]、晁继周[4]等学者均采纳该划分方式，亦有部分学者规避这一术语。晁继周对类词缀概念给予肯定，认为该界定方式能够有效化解虚语素范畴的学术分歧，为词根、词缀之间的过渡性语素提供合理归类标准。关于表人类后置语素，学界已有明确划分：吕叔湘[5]将“家、员、人、民”4个表人语素划定为类后缀；张斌进一步扩充范畴，归纳出“家、员、民、才、工、佬”等29个表人类后缀。即便部分学者未采用“类词缀”术语，该概念的提出也拓宽了汉语词缀的研究范畴，例如董秀芳[6]将“家、者、手、员、工、人、师、匠”等后置指人语素统一归为后缀。

在各类类词缀中，后置指人语素“手”的词性判定历来是汉语学界的研究热点。吕叔湘明确将“手”视为后缀，指具有某种专长或掌握某种技术的人[5]。任学良认为“手”作为指人词尾是从古代汉语沿用下来的[7]。陈光磊[8]、张斌[2]、尹海良[9]等进一步将其界定为类词缀，认为“手”位置固定、语义虚化、构词黏着。马庆株提出“准词缀”概念，将“X+手”归入准后缀[10]。马晶晶指出，类词缀“手”表示“擅长某种技能、从事某种工作、具有某种身份或特性”的类化意义[11]。尽管学界对“手”的属性仍有



争议，但将其归入类词缀是较为稳妥的界定。本文采纳这一观点，将“手”视为表人类词缀展开研究。

人体词汇是语言中最基本、语义扩展最活跃的范畴之一。根据具身认知理论，人体部位词普遍通过隐喻、转喻等机制由具体器官义向抽象意义延伸。汉语属汉藏语系，越南语属南亚语系，二者虽谱系不同，但长期语言接触使其在词汇构词、语义演变方面呈现诸多共性，“手”类表人构词即是典型例证。汉语“手”发展为表人类词缀，构成“歌手、高手、选手”等复合词；越南语则形成双轨系统是汉越词“thủ”（如 cao thủ 高手）与纯越词“tay”（如 tay chơi 玩家）。

目前学界对汉语“手”表人类词缀研究已较充分，但对越南语“thủ”与“tay”的探讨多集中于单一系统描写，缺乏与汉语的系统性对比。鉴于此，本文以隐喻转喻理论、语法化理论、语言接触理论为支撑，采用“语料统计 + 理论分析 + 对比研究”的方法，选取汉语“X + 手”64个、越南语“X + thủ”39个、“tay + X”27个作为研究对象，重点考察三个问题：第一，汉越语“手”类表人成分的语义演化路径与语法化层级差异；第二，汉语“手”、越语“thủ”与“tay”在构词、语义、句法及语用色彩上的具体区别；第三，导致上述差异的认知动因、文化模式与语言接触机制。

2. 汉语“手”表人类词缀分析

2.1. “手”的语义演变与词缀化路径

“手”金文作，本义为人体上肢腕以下持物的部分。小篆作，《说文·手部》：“手，拳也。象形。凡手之属皆从手。”段玉裁注：“拳也。今人舒之为手。卷之为拳。其实一也。故以手与拳二篆互训。”战国时出现了“X + 手”指代人的用法，如“中手”，表示技能中等的人。两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手”指代人的用法少见，多是“A + 手”式，表示在某一领域具有较高技艺或水平、具有丰富经验的人，如巧手、高手、佳手等。唐代至元代，以“手”指代人用法已日臻成熟，“手”指人的用例与前代相比数量猛增，主要表示“在某种技术或工作中居某种地位的人”与“从事某种行业、活动或作出某种行动的人”两种意义，且主要与军事职业相关。至明代，“手”的语义有了较大变化：类词缀“手”产生，“手”的语义有所虚化，均表示类称，用以表示“从事某种行业、活动或作出某种行动的人”，仍主要与军事职业相关。以“手”代人的用例不仅在数量上大大增加，而且之前已经出现的如“对手、敌手、帮手”等在这两个时期也都有了比较高的使用频率。此时，“手”已成为一个指人类词缀。

姬培培认为自先秦“手”出现表人用法以来，语义不断虚化，直至明代产生类词缀用法，但功能尚不完全，清代继续发展，至现代则发展为成熟的类词缀[12]。根据语法化程度来看，汉语“手”已发生高度语义漂白，彻底淡化人体手部本义，泛化为专指身份技能的类化意义；同时出现形态磨损与黏着性增强，位置强制后置、无法独立单用、构词黏着固化。综合语义虚化、形态依附、句法固化等特征，本文将汉语“手”归为高度语法化类词缀，语义高度抽象、能产性稳定，已基本丧失与“手”本义的直接联想。

2.2. 构词方式

王珏对汉语“X + 手”表人复合词中前置成分“X”的语法性质进行了系统界定，认为其主要分为名词性、动词性、形容词性、数词性四种类型[13]。这四种不同词性的“X”，不仅决定了“X + 手”整个复合词的语义重心，还对其构词规则形成了明确限制；而后置成分“手”的位置始终固定不变，不再承担具体的身体器官语义，仅发挥表人类化功能，已呈现出稳定的类词缀特征。

当X为名词语素或名词性短语时，构词逻辑为“领域/工具 + 执行者”，即“手”指称在该领域或借助该工具从事活动的人，如“鼓手”“水手”“车手”“枪手”。此类构词的能产性为中等水平，多数搭配已高度固定，不可随意类推，如“鼓手”不能说成“锣手”。语义透明度整体较高，但“水手”等词已出现语义漂白，不再直指“与水发生动作”，而是转指“水上工作者”。

当 X 为动词语素或动词性短语时，构词逻辑为“动作 + 执行者”，即“手”指称实施该动作的人，如“打手”“写手”“下手”“助手”“猎手”。此类构词的能产性为中等偏低，主要集中于高频、语义明确的动作动词，而“唱手”“跳手”并不成立，说明只有能够与“技能”“职业”或“固定行为模式”建立稳定关联的动词才具备构词资格。语义透明度普遍较高，但“下手”已发生语义专门化，特指“辅助性执行者”并带有贬义色彩。

当 X 为形容词语素或形容词性短语时，构词逻辑为“评价 + 具有该特征的人”，即“手”指称具备某种技能或操作特征的人，如“高手”“老手”“新手”“笨手”。此类构词的能产性为中等水平，X 限于固定的评价形容词，褒义、中性、贬义均有分布，但贬义数量较少且语气温和。部分词汇已产生隐喻泛化，如“老手”不再指年龄大的人，而是泛指“经验丰富的人”。此外，“高手”等词在口语中可受程度副词修饰(如“他很高手”)，显示出名词形容词化的倾向，说明“X+ 手”构式的语法边界并非完全封闭。

当 X 为数词或数词性短语时，“X+ 手”构词能产性极低且高度规约化，仅以“一把手”为典型代表，构词逻辑由数量位次指向权力层级，“手”进一步抽象为主事者、核心角色，语义完全脱离身体部位本义，呈现深度隐喻化与词汇化特征；此类结构几乎不可类推，仅“二把手”在口语中偶见仿用，更高数词搭配则完全不成立，语义透明度低、整体习语化强，语法上保持稳定名词属性，无形容词化倾向，是“X+ 手”构式中封闭性最强、类词缀虚化程度最高的类型，鲜明体现出 X 词性对构词能产性与语义演变的强制约作用。

总体来看，X 词性的差异直接决定了“X+ 手”的构词能产性与语义透明度，体现出明显的类型约束。

2.3. 语义范畴

根据对 BCC 语料库的统计，汉语“X + 手”表人词汇共 64 个。按照语义功能可分为四大类：职业类、能力类、行为执行者类及身份性格类。各类词汇的数量及占比如下：职业类 29 个(45.3%)、能力类 17 个(26.6%)、行为执行者类 13 个(20.3%)，身份性格类 5 个(7.8%)。这一分布表明，“手”的核心功能是标示“职业身份”和“技能水平”，而较少用于描写抽象的性格特征。

2.3.1. 职业类

此类词汇的核心语义是“从事某种职业或特定活动的人”，指向具体的职业活动或领域，语义明确且固定。典型示例：歌手(从事歌唱职业的人)、选手(参加比赛的人)、写手(从事写作活动的人)、鼓手(演奏鼓的人)、舵手(掌舵的人，也比喻领导者)、水手(在船上工作的人)。此类词汇的构词逻辑为“活动/领域 + 表人词缀‘手’”，与“手”的搭配具有较强的固定性，不可随意替换。例如，“从事歌唱活动的人”只能说“歌手”，不能说“唱手”(“唱手”在现代汉语中不规范，仅在部分方言或历史语境中使用)。

2.3.2. 能力类

此类词汇的核心语义是“具有某种技能或能力的人”，强调人的技能水平、经验或特长，语义具有评价性。典型示例：高手(技能高超的人)、能手(擅长某种技能的人)、老手(经验丰富的人)、好手(技能较好的人)、快手(做事速度快的人)、巧手(手艺精巧的人)、笨手(技能笨拙的人)、生手(缺乏经验的人)。此类词汇的构词逻辑为“能力/水平 + 表人词缀‘手’”，可分为褒义(高手、能手、巧手)、中性(老手、生手)、贬义(笨手)三类，情感色彩相对温和，未出现强烈的褒贬极端。

2.3.3. 行为执行者类

此类词汇的核心语义是“执行某种特定行为的人”，指向具体的动作行为，语义具有较强的动作性。典型示例：枪手(使用枪支的人)、打手(受雇从事暴力行为的人)、助手(协助他人做事的人)、帮手

(帮助他人做事的人)、下手(执行具体动作的人,多含贬义,也指助手)。此类词汇的构词逻辑为“行为+表人词缀‘手’”,部分词汇(如打手)带有一定的贬义色彩,但情感色彩仍较为克制,未出现极端化表达。

2.3.4. 身份性格类

此类数量最少、语义扩展程度最高的类别,核心语义为“具有某种社会身份、角色定位或性格特征的人”。语义已从“操作、技能”进一步泛化为“身份、品性”。典型示例:一把手(指单位、组织中位居首位的最高负责人)、二把手(指位居第二的负责人,强调权力层级中的身份定位)、副手(指辅助主要负责人开展工作的辅佐型角色)。

2.4. 语法特征与语用色彩

语法上,“X+手”具有名词的典型功能:可受数量短语修饰(“一个高手”),可作主语、宾语、定语(“高手对决”),部分可重叠(“高手高手”为临时用法)。需要指出的是,“X+手”一般不能受程度副词修饰(*“很高手”),但“高手”等词在口语中可受“很”修饰(“他很高手”),这是名词形容词化的表现,说明部分“X手”正在发生词性游移。

语用色彩方面,“X+手”呈现“两头小、中间大”的分布:大多数成员为中性,如“鼓手、水手、选手”;褒义成员主要集中在技能水平类中的“高、能、强、好、老”等,如“高手、能手”;贬义成员主要有“打手、杀手、枪手、低手”(“低手”带有一定贬斥意味)。值得注意的是,“新手”“生手”虽指经验不足,但不含明显贬义,属中性指称。

3. 越南语“手”类表人词缀分析

3.1. “Thủ”和“tay”的语义来源

“Thủ”与“tay”在结构限制、搭配范围及能产性上的系统差异,并非偶然,而是汉语外来构词规则与越南语固有词汇演化机制在长期语言接触过程中分层共存与功能分化的结果。从语言类型学角度看,这种“外来成分后置、本土成分前置”的对立,本质上反映了越南语作为南亚语系语言,在吸收汉藏语系构词模式时发生的结构妥协:汉越词“thủ”模借了汉语“中心语后置”的规则,而纯越词“tay”则保留了南亚语典型的“修饰语前置”倾向(尽管越南语整体为SV型语言,但在复合词层面存在前置与后置并存现象)。

与之相对,“tay”是越南语固有的身体词,自古表示“手、肢体”,长期保持实义用法。其“人”义主要通过转喻机制在口语中自然扩展(如tay buôn、tay lái),并未受到汉语构式的强制规约。“tay”保留越南语前置构词习惯(tay+X),能够较为自由地与本土动词、名词甚至短语结合,具有较强的实时构词能力。同时,tay还表现出由词汇向句法层面过渡的特征,仍属半实义语素。

从语法化角度看,汉越成分“thủ”已发生较明显的语义漂白,其“手”的原始意义逐渐弱化,并在长期构词过程中形成较稳定的搭配模式,呈现出一定的构词黏着倾向,但尚未完全虚化为纯粹词缀。相比之下,纯越词“tay”仍保留较强的词汇独立性与身体部位义,可自由充当句法成分,但在“tay+X”结构中亦出现一定程度的语义泛化。受汉语接触影响,越南语逐渐形成了以汉越成分“thủ”与纯越词“tay”为核心的双轨表人系统,二者在语序模式、语法化程度、语体风格及构词能产性等方面呈现出明显的互补与对立关系。

3.2. 构词分析

越南语中与“手”相关的表人构词呈现汉越词“thủ”与纯越词“tay”并行的双轨格局。两套系统在

构词位置上截然相反：“thủ”采用后置结构(X + thủ)，而“tay”采用前置结构(tay + X)。以下按 X 的词性类型对两套系统进行对比分析。

当 X 为名词语素或名词性短语时，在“thủ”系统中，X 几乎全部为双音节汉越名词语素，构词逻辑为“领域/对象 + thủ”，语义指向“从事该领域的人”或“具有对抗关系的人”，如“cầu thủ”（球手）、“địch thủ”（敌手）、“cung thủ”（弓手）、“thủy thủ”（水手）、“kì thủ”（棋手）、“pháo thủ”（炮手）。在“tay”系统中，构词逻辑为“tay + 领域/对象”，语义更为宽泛，既可表示职业身份，如“tay súng”（枪手）、“tay anh chị”或“tay giang hồ”（江湖人物）、“tay nhiếp ảnh”（摄影师）。

当 X 为动词语素或动词性短语时，两套系统的差异进一步放大。在“thủ”系统中，X 为动词语素的情况不多，典型例子如“xạ thủ”（射手）、“đấu thủ”（斗手）、“tuyển thủ”（选手）、“đối thủ”（对手）、“trợ thủ”（助手）。在“tay”系统中，X 为动词语素或动词性短语是最为核心且能产性最高的构词模式，构词逻辑为“tay + 动作”，语义为“执行该动作的人”，如“tay chơi”（玩家）、“tay viết”（写手）、“tay lái”（司机）、“tay bắt cướp”（抓贼的人）。

当 X 为形容词语素或形容词性短语时，两套系统的表现再次分化。在“thủ”系统中，此类构词几乎仅有“cao thủ”一例，“thấp thủ”（低手）并不成立。在“tay”系统中，构词逻辑为“tay + 评价特征”，语义为“具有该特征的人”，涵盖从高到低的完整评价光谱，如“tay mơ”（生手）、“tay lão luyện”（老手）。此类构词的能产性为中等水平，常见评价形容词均可进入，但创造性略低于动词性 X。

3.3. 语义范畴

根据对 VietLex 语料库的统计，“X + thủ”表人词汇共 39 个，“tay + X”表人词汇共 27 个，两系统共计 66 个词汇。两套系统在语义范畴上既有交叉重叠，也存在明确的功能分工。按照语义功能可分为四大类：职业类、能力类、行为执行者类及身份性格类。各类词汇的数量及占比如下：职业类 29 个(占总量的 43.9%，其中“X + thủ”26 个)、能力类 9 个(占 13.6%，其中“X + thủ”4 个)、行为执行者类 18 个(占 27.2%，其中“X + thủ”7 个)、身份性格类 10 个(占 15.3%，其中“X + thủ”2 个)。数据显示二者功能分工清晰：汉越词“thủ”高度集聚于职业类，兼涉部分行为执行者类，多用于职业身份与特定行为的正式称谓；纯越词“tay”则侧重覆盖行为执行者、身份性格范畴，并在能力语义上与“thủ”形成互补，更适于动态行为与社会角色的灵活表达。

3.3.1. 职业类

职业类词汇的核心语义是“从事某种固定职业或专门活动的人”。在这一范畴中，“thủ”与“tay”均有分布，但呈现不同的使用偏好。“thủ”系统中的职业类词汇数量有限，且多限于需要较高技能或具有竞技性质的职业领域，典型例词包括“cầu thủ”（球员）、“xạ thủ”（射手）、“đao thủ”（刀斧手）、“tuyển thủ”（选手）。这些词汇均为汉越词来源，语义正式、书面化程度较高，且多用于体育竞技领域。相比之下，“tay”系统中的职业类词汇更为丰富且口语化，构词更为灵活，典型例词包括“tay đua”（车手）、“tay vợt”（网球手）、“tay săn”（猎人）、“tay viết”（从事写作活动的人）。

3.3.2. 能力类

能力类词汇的核心语义是“具有某种技能水平、经验程度或操作特征的人”。在这一范畴中，“thủ”系统与“tay”系统均较为活跃，但语义侧重点和情感色彩存在差异。“thủ”系统中的能力类词汇主要集中于对“高水平”的评价，典型例词包括“cao thủ”（高手）、“danh thủ”（名手，指著名选手）。“Tay”系统中的能力类词汇则涵盖从高到低的完整评价光谱，褒义者有“tay lão luyện”（老手），贬义或弱贬义者有“tay non”（新手）、“tay mơ”（生手）。

3.3.3. 行为执行者类

行为执行者类词汇的核心语义是“执行某种具体动作或行为的人”，其中 X 多为动词性成分。在这一范畴中，“thủ”系统的参与度较低，缺乏具有能产性的“动词 + thủ”表人构式。现有例词多为高度词汇化的汉越词，如“xạ thủ”（射手）、“đấu thủ”（斗手）、“trợ thủ”（助手）、“đối thủ”（对手）。但其中的“xạ”（射）、“đấu”（斗）、“trợ”（助）、“đối”（对）。虽来源于动词，却已在构词中语素化，主要以词汇单位的形式存在，难以作为可自由组合的动词性成分参与新的构词过程。“tay”系统在该范畴中展现出极强的构词活力，能够广泛接纳动词及动词性短语，形成“tay + X”的表人结构。典型例词包括“tay cướp”（抢劫者）、“tay lái”（驾驶者）等。

3.3.4. 身份性格类

身份性格类是越南语“tay”系统特有的语义范畴，在汉语“手”和越南语“thủ”系统中均无对应。此类词汇的核心语义是“具有某种社会身份、角色定位或性格特征的人”，X 多为名词性或形容词性成分，语义已从“操作、技能”进一步泛化为“身份、品性”。典型例词包括“tay anh chị”（黑社会分子）、“tay giang hồ”（指在社会上混的人）、“tay lừa đảo”（骗子）、“tay chơi”（享乐的人）、“tay cờ bạc”（赌徒）等。

3.4. 语法功能与语用色彩

语法功能上，“tay + X”与“X + thủ”均表现为名词性结构，但二者在句法灵活性与构式封闭性上存在显著差异。首先，“X + thủ”整体表现为高度词汇化的名词单位，在句法上可充当主语、宾语或定语，如“Anh ấy là một cao thủ võ thuật”（他是一位武术高手）、“Bọn họ là đối thủ của tôi”（他们是我的对手）。然而，该结构内部构词机制已基本固化，“thủ”不再参与实时构词，其句法功能稳定但扩展性弱。

“tay + X”则呈现出较强的构式活跃性，整体仍保持一定的语法生成能力。在语句中，该结构可作为名词短语充当主语或宾语，并可接受数量短语或限定成分修饰，如“một tay lái giỏi”（一名优秀司机）、“những tay chơi mới”（新玩家）。同时，该结构在口语中具有较强的临时生成能力，体现出词汇与句法之间的过渡特征。

在语用色彩方面，“thủ”系统整体趋于中性与书面化，情感表达较为克制。无论褒义还是贬义，均已高度词汇化，情感色彩主要由整体词汇承担，而非“thủ”本身。“tay”系统的语用色彩更为多样且生动。其评价意义往往通过具体语境即时生成，既可表示褒义(tay lão luyện)，也可表示贬义(tay non)，甚至带有明显的语气强化与情绪表达功能，如“tay lừa đảo”（骗子）、“tay giang hồ”（江湖人物）等，语用色彩更直接、更具口语性与表现力。

4. 汉越语对比分析

基于前文对汉语“手”、越南语“thủ”与“tay”的分别分析，结合语料统计数据，从共性与差异两个维度，对三者进行系统对比，揭示汉越语“手”表人类词缀的本质特征。

4.1. 隐喻映射路径

汉越语“手”类表人词缀的语义演化，均基于相同的认知基础——具身认知。人类普遍通过自身身体经验认知世界，“手”作为最重要的操作器官，与“操作、技能、行动”天然相关，这种共同的身体经验，使得汉越语均通过隐喻与转喻机制，实现了“手”从“身体器官”到“表人成分”的语义扩展，形成了“手→操作→能力→人”的共同隐喻路径。例如，汉语“高手”、越南语“cao thủ”，均是通过“手”隐喻“高超的技能”，再转喻“具有高超技能的人”，认知逻辑完全一致。

4.2. 构词能力

汉越语“手”类表人构词均体现出词根 X 和表人标记(手/thủ/tay)的组合式构词逻辑,其中 X 负责提供核心语义信息(职业、能力、行为或身份),表人标记负责实现指人功能。在语序表现上,该类构式既体现出汉语与“thủ”系统的后附式特征,也体现出“tay”系统的前附式特征,整体上反映出孤立语中构词与句法之间的紧密关系。

这一构词逻辑的相似性,一方面源于人类认知中基于身体经验的普遍隐喻机制,另一方面也与汉越语长期语言接触密切相关。在语言接触过程中,越南语“thủ”系统在汉语“X+手”构式的影响下,通过模式类推形成了对应的后附式结构,而“tay”系统虽为纯越词汇体系,但在发展过程中亦逐渐形成与之相似的组合式构词模式。

本文以语义漂白、形态磨损、构词黏着性、句法固化、能产性五项核心参数为标准,系统衡量三者语法化层级:其一语义漂白,指实词具体义抽象泛化、实义残留消退;其二形态磨损,指语音形式弱化、丧失独立单用能力;其三黏着性,指语素依附固定位置、不可自由拆分换位;其余辅以句法固化与构词能产性综合判定。依托这套学界通用参数可清晰看到,汉越语“手”类表人构词成分的语法化程度呈现出明显的连续统差异。

汉越语“手”类表人构词成分的语法化程度呈现出明显的连续统差异,可大致表示为:汉语“手” > 越南语“thủ” > 越南语“tay(语法化程度最低)”。其中,汉语“手”已发展为典型类词缀,语义高度虚化,主要承担表人功能,构词能力较强;越南语“thủ”处于半实义词向类词缀过渡阶段,语义部分虚化,搭配范围受限,构词能力中等;越南语“tay”仍保留较强的本义特征,语义虚化程度较低,处于由实义词向半实义词演化阶段,构词能力虽强,但语法化程度最低。

这一语法化程度的差异构成汉越语“手”类表人词缀系统差异的深层机制,并进一步影响三者 in 构词自由度、语义泛化程度及语用分布上的系统性差异。

4.3. 语义泛化差异

汉语“手”语义泛化程度中等,语义范围相对明确,主要用于表示“从事某种职业、具备某种能力、执行某种行为的人”,语义较为固定。值得注意的是,汉语“手”与“手”本义已无直接联想(如“歌手”不再使人联想到手部动作,“水手”也不直接指向“与水发生动作”),属于已完成语义漂白的类词缀。

越南语“thủ”语义泛化程度中等,与汉语“手”高度相似,语义范围限于“职业、能力”相关的人,与“手”本义关联较弱。这是其作为汉越借词、复制汉语语义范畴的直接体现,属于受汉语影响的弱类词缀。“tay”语义泛化程度最高,语义范围最为宽泛。其不仅能表示职业、能力、行为执行者,还能延伸至身份、性格、社会角色等范畴,如“tay anh chị”、“tay giang hồ”(江湖人物),语义可根据表达需求灵活延伸。同时,“tay”与“手”的本义仍保持较强关联(如“tay lái”直指“用手驾驶”),尚未完成语义漂白,处于由实义词向半实义词演化的中间阶段。

4.4. 语法功能

汉语“X+手”已高度类词缀化,整体表现为稳定的名词性单位。在句法中,可自由充当主语、宾语、定语等成分,但内部结构已不可拆分或实时再生产。其语法功能主要体现为词汇层面的名词标记,属于封闭的词汇单位。

越南语“X+thủ”与汉语结构高度对应,整体同样为名词性单位,可充当主语、宾语或定语。但其构词能力已基本冻结,难以参与新的构词过程,语法功能稳定但生产力较低,主要依赖既有词汇库存,同样属于封闭的词汇单位。越南语“tay+X”则表现出明显的中间状态:一方面具备名词短语的句法功

能,可接受数量短语或限定成分修饰(如“một tay lái giỏi”——一名优秀司机);另一方面仍保留一定的实时构词能力,能够在语境中生成新的组合形式。因此,其语法属性更接近“词汇—句法连续体”,而非完全封闭的词汇单位。

4.5. 语用色彩差异

汉语“手”:情感色彩温和,多为中性,即使带有褒贬意义,也无极端化表达,如“笨手”(贬义)、“高手”(褒义),情感表达克制。

越南语“thủ”情感色彩与汉语“手”一致,多为中性,褒贬意义温和,无极端化表达,如“cao thủ”(褒义)。越南语“tay”:情感色彩丰富且鲜明,但需注意区分构式整体情感与词缀本身情感。例词如“tay lừa đảo(骗子)”“tay giang hồ(江湖人物)”的负面评价主要来源于X词根(lừa đảo、giang hồ),而非“tay”本身赋予。然而,“tay”确实比“thủ”和汉语“手”更具情感放大效应,在同样表示“新手”时,“tay mơ”比“người mới”带有更强的“稚嫩、不靠谱”的隐含评价。因此,“tay”系统的情感表达更为直接、生动,且容易在语境中衍生出额外的评价色彩,这是其语法化程度较低、实义残留较多的表现。

因此,汉语“手”与“thủ”趋于“去情感化”,而“tay”则呈现“情感强化”倾向。

4.6. 差异的动因

汉越语“手”类表人成分在语法化程度、构词模式、语义泛化及语用色彩上的系统性差异,并非偶然形成,而是语言系统内部演化、语言接触分层渗透与文化认知模式差异三者协同作用的结果,具体可从以下三方面展开阐释:

第一,语言系统内部演化的阶段分野,是差异形成的内在基础。汉语“手”历经自先秦至明清数百年的持续语法化,完成了从实义词到高度语法化类词缀的完整演化。而越南语“tay”的指人用法多源于口语中自然、晚近的转喻扩展,未经历漫长的语法化洗练,仍保留较强的实义残留。“thủ”虽借自汉语“手”,但受越南语本土系统制约,语法化进程放缓,仅达到中度水平。

第二,语言接触的层次性与选择性吸收,塑造了双轨并存的格局。越南语长期受汉语深度影响,形成了“汉越词”与“纯越词”并行的双层词汇系统。汉越词“thủ”选择性吸收了汉语的后置构词模式与语法化倾向,承载了更具语法化特征的表人功能;纯越词“tay”则完全保留本土前置构词习惯,未受汉语构式的强制规约。这形成了“外来固化、本土开放”的功能分工模式——外来成分走向词汇化与封闭,本土成分保持构式活力与开放性。

第三,文化认知模式的本质差异,决定了语义扩展与语用表达的偏向性。汉语文化倾向于将“手”高度抽象化、范畴化,强化其作为“职业、能力”分类标签的类化功能,因此语义稳定、语用中性。越南语文化则更注重“手”作为操作主体的动态性与具身性,这一倾向在越南语习语中多有体现,未对“手”进行高度抽象化处理。因此“tay”能够灵活延伸至身份、性格等语义范畴,在描写具体行为时更具活力,语用色彩也更鲜明生动。

三者相互关联、相互影响:语言系统的演化阶段决定了语法化的基础水平,语言接触的分层性塑造了构词模式的双重格局,而文化认知模式则进一步强化了语义与语用的差异,共同构成了汉越语“手”类表人成分差异的完整动因体系。

5. 结语

综上所述,汉越语“手”类表人构词系统在语法功能与语用色彩上呈现出清晰的层级差异:汉语“手”已完成类词缀化,表现为高稳定性与低能产性;越南语“thủ”处于语法化中间阶段,表现为词汇化与结

构固化并存；而“tay”则仍保留较强的词汇-句法生成能力，呈现出开放性与动态性特征。在语用层面，三者均遵循“中性为主、两极分化有限”的总体趋势，但“tay”系统由于其本土性与口语基础，更易发展出丰富的情感评价与语境依赖意义，体现出更强的表达弹性。这种差异本质上反映了汉越语在长期语言接触过程中，不同来源成分在语法化路径、构词机制及语用扩展能力上的分层发展与功能分工。由此可提炼出一个具有跨语言参考价值的理论命题：在语言接触中，外来构词成分(如汉越词“thủ”)倾向于保持与源语言一致的结构位置(后置)，并走向语法化与词汇化，能产性逐步下降；而本土成分(如纯越词“tay”)则保留固有语序(前置)，并保持更高的构式开放性与语用弹性。

参考文献

- [1] 陆志韦. 汉语的构词法[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7.
- [2] 张斌. 新编现代汉语[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 173-178.
- [3] 王洪君, 富丽. 试论现代汉语的类词缀[J]. 语言科学, 2005, 4(5): 3-17.
- [4] 晁继周. 二十世纪的现代汉语词汇学[M]//语文词典论集.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 [5] 吕叔湘. 汉语语法分析问题[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 [6] 董秀芳. 汉语的词库与词法[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98-101.
- [7] 任学良. 汉语造词法[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 [8] 陈光磊. 汉语词法论[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94: 23+30.
- [9] 尹海良. 现代汉语类词缀研究[D]: [博士学位论文]. 济南: 山东大学, 2011.
- [10] 马庆株. 现代汉语词缀的性质、范围和分类[J]. 中国语言学报, 1995(6): 101-137.
- [11] 马晶晶. 表人名词类词缀“X手”“X者”“X员”分析比较[D]: [硕士学位论文]. 大连: 辽宁师范大学, 2013.
- [12] 姬培培. 汉语类词缀“员”和“手”的演变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漳州: 闽南师范大学, 2019.
- [13] 王珏. 现代汉语名词研究[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